

# 杜维明：新人文与新启蒙

杜维明 精神人文主义 Spiritual Humanism 阅读量：200

**导读：**2007年4月，哈佛人文主义者牧师会在它成立30周年的纪念会上，和美国人文学者协会一道，给杜先生颁发了“人文主义杰出成就奖”。曾获得此奖的还有阿玛蒂亚·森、爱德华·威尔逊等来自不同学科的人文主义者。本期的推送是杜先生在颁奖会上的演讲后所接受的访谈，在访谈中，他澄清了自己所理解之人文主义的基本内涵，以及儒学如何能为此种人文主义作出应有之贡献。

儒学之所以能成为现代人文主义的重要补充，是由近代以来启蒙思潮的基本特征以及作为与世俗的启蒙主义对立的基督教世界观之内在困境决定的。旧人文与旧启蒙一方面持续制造世俗与神圣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也持续制造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杜先生则指出，“新人文”或“新启蒙”要从有机整体的角度理解日常生活和超越性追求，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Q：**我们对于西方启蒙思潮以来的人文主义也比较熟悉。但是，如果考虑到美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宗教社会，在美国讨论人文主义是比较容易的，而宣称自己是“人文主义者”而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则有些“非同寻常”。目前为止，在美国的国会议员中，只有一位公开宣称自己是人文主义者。从另一方面来看，获得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和哈佛人文主义者牧师会所奖励的，都是美国本土知识界、文化界、和政界的精英以及其他宗教和文化背景中的代表性人物。根据您的观察，在美国本土兴起的“新人文主义”思潮，其背景是什么？

**杜维明：**18世纪以来，很多重要的西方思想家都在讨论《旧约》之中亚伯拉罕把独生子献祭的案例。当然，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一直是基督新教占主导的，如你所言，依旧是一个宗教社会。但是，美国思想文化最活跃的新英格兰地区，很早就有人文主义的思潮。以哈佛为例，1838年，爱默生在神学院发表了著名的“神学院演讲”，他说耶稣只是一个伟大的人，并非神，人应该按照道德律令而不是宗教教条生活。在他演讲的中间，有一半的神学家和牧师退场抗议。在他发表演讲的礼堂，我曾经和著名的神学家考夫曼（Gordon Kaufman）有一次关于创造性的耶儒对话。最近几年，可以说美国的人文主义思潮一直是在成长中，一方面它已经成了美国当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人文主义者的组织也在不断增多。在思想界，比较彻底否定宗教的思想倾向也出现了，比如爱德华·威尔逊在美国科学界和思想界都有很大影响，他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希望科学人文主义可以取代宗教，被称为“新达尔文”。在基督教内部，一直有一派和“三位一体”思想相对立的 Unitarian，好像一般翻译为“唯一神教”，这个译名还有问题。唯一神教和马萨诸塞州的渊源很深。比如，哈佛园（Harvard Yard）对面的第一教堂（First Church）是1636年就建立的唯一神教教堂，和哈佛的历史一样悠久。唯一神教的教义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现在差不多是最开明的宗教流派，以至于被认为不是基督教的一部分，但在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影响很大。我几次演讲的时候，都有唯一神教的人士说儒家思想和他们的理念非常接近，我也希望能和他们

有进一步的交流。

**Q:** 我注意到哈佛人文主义者牧师会现任牧师格里格·爱泼斯坦对您的观点还有不同看法，比如，他说对于您公开批评“凡俗的人文主义”有些难以理解。我推测，“凡俗”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苦苦追求的生活方式，而在汉语语境中，“凡俗”或者“世俗”一直是一个贬义词。

**杜维明:**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们虽然给予我这个奖项，但是我觉得有些不安。我在受奖辞的开始就说明我所理解的“人文主义”和一般意义的“凡俗的人文主义”有很大不同。

“凡俗的人文主义”是启蒙以来发展起来的大传统，有很多资料证明，18世纪前后欧洲的启蒙主义多方面受到中国思想的影响，大家都知道法国的启蒙思想家特别是伏尔泰等人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莱布尼兹的思想和朱熹的思想系统有相合之处。有人甚至提出疑问，康德的思想体系究竟是纯粹的西方传统，还是有其他文化传统的因素。当然，启蒙主义主要还是从欧洲思想界内部，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的批评中发展出来的，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对于基督教神学的反感是不得了的，有时候不惜使用血腥的字眼。但是，因为启蒙思潮是从反对宗教和神学权威开始的，在批判荒谬的宗教信仰的同时，不仅消解了神圣性，把人的最高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诉求也切断了。凡俗的人文主义或者说旧的启蒙思潮有两个盲点，刚才说的一个，另外一个相信知识就是力量，相信人类可以把握自然，了解自然的目的是征服自然，宰制自然，把自然界只当作人类发展的资源。这两个盲点，哈贝马斯的哲学里面已经涉及到了，他提出启蒙还没有完成，但是在他整个理论体系中，宗教几乎不占重要的地位。

另外一方面“凡俗”是和“神圣”相对的，但不一定是对立的。儒家的思想特点是最高的人文理念，要在最平实的日常生活中体现，仅仅从“凡俗”的角度，是不足以理解“人文主义”的完整性的。所以我们提出，对于“人之为人”的理解不仅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也要超越人类学意义上对人的理解，人要成为“完人”。1967年，林·怀特(Lynn White)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文章，批评基督教的信仰和神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因为基督教主张人类中心主义。目前基督教神学家仍然需要回应基督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挑战，很明显，基督教是对自然抱着宰制的态度，目前有一些神学家试图从生态环保的角度，把宰制改造为“爱惜”和“保护”，但是这种转向并不是很容易，因为思想界已经从政治、经济、社会、生物和神学的角度为人类对于自然的宰制提供了依据。

**Q:** 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批评基督教由来已久；而儒家又长期被批评为“缺乏宗教性”。

**杜维明:** 陈来的观点就是中国传统宗教的人文转向很早，而梁漱溟先生则认为中国文化的理性和人文精神“早熟”。而另外的批评就是儒家只有“内在超越”，没有“外在超越”，造成很多缺失。按照韦伯的批评，新教主张世俗社会和上帝的分离，因为分离，所以从“上帝”的价值和角度，对世俗社会有很强的转化力量。而儒家则是因为认同现实社会，所以和现实政权和权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比较缺乏批评现实和转化现实的能力。

我和一些基督教神学家的争论也是在这里。如果你把儒家对于现实社会的认同当作是对于理想的放弃，那是很大的误解。比如，儒家常常把尧舜作为圣王的典范，作为君主，不仅在理论上应该学习圣贤，而且在历史现实中，就出现过这样的典范。因此，儒家的君主理想不是建立在乌托邦的基础上的。这样，它的转化的能力可能更强，甚至构成“非如此不可”的压力。另外，很多儒家学者不仅是入世的，而且当过地方官，每天都要处理诉讼、税务、河道、建筑、军事、民族、祭祀等各种问题，接触大量最丑恶的现象，他们对于复杂的现实社会的理解远远要超过在像我们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你不能说他们没有庄严的理想，他们更不是“肤浅的乐观主义”。

我也不同意中国儒家传统中压抑了“幽暗意识”的说法。“幽暗意识”和“忧患意识”的确不同。但是，很多儒家学者都是公共知识分子，对于人性的有限性、破坏性以及人的存在条件的阴暗面有充分的认识，没有“忧患意识”怎么可能。以前我们对于这一方面的了解可能太过简单了，现代的很多思想家对于“科学”“民主”的理解也比较片面。

**Q:** 我注意到梁漱溟先生关于“和解”的思想，内容很丰富。目前世界上各种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还比较普遍，各个宗教中极度排斥“异端”的力量还比较强大，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杜维明:** 这中间有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没有身份认同，精神没有归宿，而狭隘的自我认同，必定会导致冲突和矛盾。身份认同，应该和“适应”相配合，适应越好，说明认同越有价值，越可以促进认同。一般认为，理性程度越高，越宽容。但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原教旨主义也很有市场，他们利用电视和其他公众场合传教，结论就是你如果不信上帝，绝对会下地狱。这里面的分寸很难把握，但是需要自觉的自我认同的两面性。从长远来看，还是需要文明对话。阿玛蒂亚·森甚至认为任何认同都会导致冲突，最好不要强调任何身份，才能建设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我认为需要多元，但多元不是相对。在坚持自己的文化认同的同时，也能够面对自己文化传统当中的阴暗面，在公共的机制下来讨论。

**Q:** 请问，您和阿玛蒂亚·森、爱德华·威尔逊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杜维明:** 这两个人我都比较熟悉，他们现在对于美国的思想界影响很大，一个在经济学、哲学，另一个在社会学、生物学。但是，我和他们的最大不同，在于他们是反宗教的，认为宗教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不仅是鸦片——鸦片只是害你自己——而是祸害。这恰好和凡俗的人文主义者对于宗教的不敏感是一样的。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20 世纪上半叶，人们觉得宗教问题不怎么重要，但是冷战结束以来，宗教问题日益突出，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也开始讨论宗教问题。这说明最高的精神追求不能被抹杀，但是儒家反对信仰荒谬、怪诞和悖离“人之常情”的对象。我认为宗教问题，对于 21 世纪的世界和中国都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一个“小”的、不成形的宗教，都有可能造成很大的麻烦，更不要说大的宗教。而“新人文”或“新启蒙”就是要从有机整体的角度理解日常生活和超越性追求，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儒家这方面的资源非常丰富。

**Q:** 我们在美国也接触到一些华人基督教会，他们的组织形式很发达。而儒学或者儒家的宗教性要落实下去可能会有很大挑战，对于知识分子而言，通过阅读经典、参加讨论等等，实现对于终极关怀的追求大概没有问题，但是对于民众而言，儒学的宗教性或者儒教意味着什么？

**杜维明:** 这个问题的确非常重要。我个人对于祭孔、塑像、建庙、汉服等形式化的儒教理解不够，所闻所知很片面。但是，儒教在印尼、韩国等地已经是成形的宗教，在中国民间，我想也有多样的形式。要注意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经过启蒙思潮的冲击，很多中国人对于传统的价值观念在形式上都有抵触情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观念的实质也在生活中消失了，比如一个华人企业家可能对“孝”的观念不怎么重视，但是每月会拿出三分之一的薪水来奉养父母；一个在美国任教的华人教授，会把退休金主要用在供孩子读书上面，这些在美国人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现在的中国大陆，在观念的层面，儒家的思想也被广泛重视。另外，“文革”时期，关于孔子和孟子的很多文物都是靠当地的农民或工人所保护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民是受尊重的，代表了最基本的美德，而西方则是长期鄙视农民，中国目前的社会生态对于农民是很不公平的。

**Q:** 您的意思是说，除了知识界、学术界的努力以外，也要注意民间资源和呼声？

**杜维明:** 不仅如此，在文化中国地区，因为长期的反传统运动，现在知识分子成了思想资源最贫乏、创造力最苍白的群体。反而是更广大的人民，包括企业家、商人，他们身上有丰厚的思想资源和非常值得注意的思想活力，也包括民间宗教的信仰。所以，到民间去，不是向他们传教，而是要向他们学习，他们在实践上有很多经验，而我们是在理论上受干扰很多。我们最怕的是无知但又傲慢的人。这也是“新启蒙”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也有一些积极的动向，比如白先勇对于昆曲的推广，使得大家增强了对于传统文化的信心。

**Q:** 还有一个问题是思想资源发挥功能的机制问题。很多批评者认为，儒家那么强调“与万物一体”，但是，中国目前的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十分严重。爱泼斯坦就说，他自己在在中国亲身见证了大好河山如何被严重污染而政府没有拿出有效措施来应对。

**杜维明:** 我也非常担忧中国的环境问题。不经过制度建构，任何观念是没有作用的。但是，环保和生态不是孤立的，要信息透明，破除地方利益等。在孟子时代，牛山之木已经被大肆砍伐，西方有的学者已经做了这方面的研究，他们也指出，生态的破坏往往和人口膨胀、社会动乱等外部原因有直接关系，而不是某种思想所导致的。我同意他们的描述，但是，我认为心态和观念的改变还是关键的，而且任何观念都不是孤立的，而是需要改变，能够改变的。比如，大家认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比开小汽车更好，吃素食比肉食更好，那我们的环境就会改善很多。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vmU108s3MaGO6Te2DezhGA>